

少數族裔群體的三維博彩傷害風險評價

——四國案例分析

李 秉 勤

(新南威爾士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悉尼)

摘 要:本研究提出一個由“結構暴露—文化詮釋—制度吸納”構成的三維風險框架,用以分析多元文化社會中少數族裔博彩風險的形成機制與治理方式。基於這一框架,本文比較了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與加拿大(安省)的政策文件、官方報告及學術研究,系統檢視四國在暴露環境、文化詮釋差異與制度吸納能力三方面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如何彼此連動。同時,據此歸納各國的治理模式,並總結其優勢與所面臨的挑戰。研究發現,少數族裔博彩危害的核心問題並非“更高的參與率”或“更大的脆弱性”,而在於三維鏈條出現斷裂:結構性暴露分佈不均;制度化回應往往忽視文化詮釋差異;制度吸納能力受到州/省自治或平台治理邏輯的制約,使得傷害的可見性降低。相較之下,新西蘭的三維治理鏈條較為連貫;澳大利亞與加拿大(安省)呈現碎片化結構;英國則高度依賴平台端的識別機制以推動早期介入。該三維框架有助於揭示風險如何在結構暴露的背景下被文化意義重新轉譯,並最終透過制度選擇被吸納或排除。研究指出,完善少數族裔博彩數據、強化文化理解、推動文化適應力的制度化,以及改進跨平台監管,將是未來風險治理的關鍵方向。

關鍵詞:博彩危害;少數族裔;三維風險框架;結構暴露;文化詮釋;制度吸納;跨國比較

中圖分類號:F590

Three-Dimensional Risk Assessment of Gambling Harm in Minority Cultural Groups: A Four-Country Comparative Analysis

作者簡介:李秉勤,新南威爾士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教授。

Li Bingqin

(Social Policy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UNSW), Sydney)

Abstract: This study proposes a three - dimensional risk framework—structural exposur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institutional uptake—to analyse how gambling risks for minority groups are produced and governed i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Using this framework, the article compares policy documents, official reports, and academic research from Australia, New Zealand, the United Kingdom, and Canada(Ontario) .It examines cross - national differences in exposure environment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uptake capacity, identifies how these dimensions interact, outlines each country’ s governance model, and highlights their respective strengths and ongoing challeng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re issue in minority gambling harm is not “higher participation” or “greater vulnerability”, but the fact that the three - dimensional chain breaks: structural exposure is uneven;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often overlook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and institutional uptake is constrained by state/provincial autonomy or platform - driven governance logics, reducing the visibility of harm. In comparison, New Zealand maintains a relatively coherent three - dimensional governance chain; Australia and Canada(Ontario) exhibit fragmented structures; and the UK relies on platform - side identification to enable early intervention. The framework helps revealing how risks are translated through cultural meaning in contexts of structural exposure, and how institutions ultimately choose to absorb or exclude them.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improving minority gambling data, enhancing cultural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ising cultural adaptability, and strengthening cross - platform regulation are critical directions for future risk governance.

Key words: gambling harm; ethnic minorities; three - dimensional risk framework; structural exposur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systemic uptake; cross - national comparison

引言

在澳大利亞、加拿大與英國等多元文化社會中，少數族裔（非主流語言與文化群體）的博彩參與率與賭博失調率往往高出主流群體 20% ~ 50%，財務破產、自殺風險與家庭暴力後果亦顯著更重（Hing, et al., 2022; Dickins & Thomas, 2014）。隨著數字博彩平台與精準廣告大量滲入非英語社群，風險急遽攀升，卻未在現行治理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識別與回應。於是便形成當前少

數族裔博彩風險治理的核心矛盾：高暴露與高危害並存，卻伴隨低可見度與低介入度。

過去十年間雖累積了豐富的少數族裔博彩研究資料，卻始終缺乏一套能整合結構、文化與制度因素的系統性分析框架。既有研究多從監管工具或公共衛生視角切入，較少探討結構、文化與制度之間的交互作用（Abbott, et al., 2018; Keen, et al., 2021; Williams & Volberg, 2013），因而難以解釋：條件相似的多元文化國家，為何在少數族裔博彩風險治理上呈現明顯分化的政策路徑與

成效差異？

實務層面的挑戰可歸納為三個相互疊加的維度。第一，結構暴露強度極高：博彩場域密度、數字化博彩管道的爆發式擴張，以及廣告管制滯後。第二，文化詮釋落差顯著：政策常將語言翻譯視為文化調適，卻忽略羞恥感與家族角色如何重塑賭博行為的意義與求助意願。第三，制度吸納能力不足：語言服務有限、求助路徑繁複、社區動員薄弱（Dyall, 2010; Wardle, et al., 2019）。三者交織之下，少數族裔的高風險經常難以被主流制度有效辨識與納入治理軌道（Dickins & Thomas, 2014）。

因此，問題的本質不在於少數族裔的文化特質，而在於現行制度未能充分處理文化差異、吸納多元需求，使得風險在治理鏈條中被系統性低估或錯置回應。現有理論亦尚未完整揭示這一鏈條式風險生成與治理斷裂的動態機制。

基於上述缺口，本文提出“三維風險分析框架”，主張唯有同時檢視結構暴露、文化詮釋與制度吸納三個維度的交互作用與斷裂情況，方能理解少數族裔博彩風險的生成邏輯、累積效應，以及治理成效的差異根源。為驗證並深化此框架，本文以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與加拿大（安大略省為主）四個典型多元文化社會為比較對象，聚焦三個核心問題：（1）各國採取何種少數族裔博彩風險治理路徑？（2）這些路徑在結構、文化與制度條件上存在哪些關鍵差異？（3）上述差異如何形塑治理實效？

本文期望透過此三維框架，不僅揭示不同治理模式背後的制度邏輯，也為高度觀光化與多族群並存的地區（如澳門）提供一定

的政策啟示。

1 三維風險分析框架：結構暴露、文化詮釋與制度吸納的動態耦合

本研究不將少數族裔博彩風險視為單一因素的產物，而是視為結構暴露、文化詮釋與制度吸納三個維度持續交互與耦合的動態結果。三個維度分別植根於既有文獻，卻長期各自為政：結構研究顯示博彩場域密度、廣告觸達與數字博彩管道可及性構成風險暴露的首要條件（Livingstone & Rintoul, 2020; Hing, et al., 2022）；文化研究揭示羞恥感、宗教禁忌與家庭角色如何重塑賭博行為的社會意義，進而抬高或壓低危害被承認與求助的門檻（Dyall, 2010; Gainsbury, et al., 2019; Keen, et al., 2021）；治理研究則強調識別責任何者承擔、於何處發生、依何標準執行，決定風險能否及時進入正式服務體系（Wardle, et al., 2019; Abbott, et al., 2018）。

此框架的核心主張在於：少數族裔博彩風險的生成與治理成效，取決於三個維度間是否形成有效耦合，以及斷裂發生在哪一節點。當結構暴露强度高、文化詮釋使危害在社群內不易被承認為“問題”、且制度將識別責任完全交給自願求助的醫療體系時，風險便會高度累積卻幾乎不可見，這是最惡性的組合，常見於澳大利亞的華人與印度裔社群（Hing, et al., 2022）。若文化詮釋提升了承認度，卻因缺乏多語服務與文化仲介而無門可入，則求助需求會遭遇制度性阻斷，加拿大安省部分南亞裔社群即屬此例（Gainsbury, et al., 2019）。反之，若制度強行介入但忽略文化敏感性，如僅依賴平台演算法強

制限額，則易引發抗拒並削弱信任，英國早期針對東亞裔的措施即為典型案例（Wardle, et al., 2019）。

“正向耦合”僅在三維同時咬合時出現：結構暴露受到嚴格管控，政策標準與資源配置納入文化詮釋因素，識別責任在平台、社區與醫療端形成協同，新西蘭對毛利與太平洋島裔的治理最接近此狀態（Dyall, 2010; Reith & Wardle, 2022）。反之，若單一維度收緊而其他兩維未能跟上，風險不會消失，而會向離岸或未受監管管道外移。澳大利亞近年經驗已充分證實此種斷裂外移的後果（Livingstone & Rintoul, 2020; Hing, et al., 2022）。

基於此耦合框架，本文提出三項機制性命題，作為四國比較分析的核心支軸：

1) 結構命題：博彩許可與廣告監管的集中度提高，並不必然導致博彩參與率下降，但會改變博彩暴露進入治理體系的方式。當監管權責集中時，博彩暴露較可能以制度可識別、可回應的形式，被納入統一的政策與監管邏輯之中；反之，在權責分散的體系下，暴露更容易停留於地理、市場或平台層面的碎片化狀態，難以形成一致的治理入口（Livingstone & Rintoul, 2020）。

2) 文化命題：將文化詮釋納入政策標準與資源配置（如雙語文化仲介、對羞恥與家庭規範具敏感度的求助管道），制度對少數族裔博彩風險的可見度與介入率才會顯著提升（Dyall, 2010; Gainsbury, et al., 2019）。

3) 制度命題：將識別責任前移至平台端，在執法可及性高、跨平台資料可整合且離岸博彩占比較低的情境下，能提升高風險行為的早期攔截率；反之，當離岸或未受監

管平台佔據顯著市場比例時，制度內部的嚴格吸納可能誘發風險外移，使高危行為更深度脫離正式治理體系（Reith & Wardle, 2022; Hing, et al., 2022）。

後續章節將依據這一耦合框架，先以三維交互狀態對四國進行治理類型劃分，再系統檢驗上述命題，從而揭示少數族裔博彩風險治理的制度邏輯與路徑分化。本框架不僅統合既有文獻，也為多元文化社會中風險不平等的比較研究提供一個兼具解釋力與政策指向的分析工具。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結合政策分析與系統性文件審閱兩種方法。資料來源涵蓋 2010-2024 年間四國的政策文件、官方統計、公共衛生報告與同行評審研究文獻。所有文本均依“結構暴露”“文化詮釋”“制度吸納”三個維度進行編碼。編碼採用雙人獨立標註，並在分歧處透過討論達成共識，以確保分析的信度與一致性。

跨國比較採取“框架導向”策略，而非制度清單式比較，使四國在不同監管體系下的政策環境得以在共同的分析邏輯下對齊。為避免不同統計時間窗造成偏誤，本文統一採用“過去 12 個月”作為博彩參與與風險暴露的分析視窗。英國博彩委員會（UKGC）雖以“過去四週”參與率作為主要指標，但亦提供“過去 12 個月”的參與資料。本文採用後者，使之與澳大利亞、新西蘭及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官方口徑保持一致。12 個月視窗亦符合行為研究與公共衛生領域的通行做法（如 PGSI 亦以 12 個月

為基準),有助於增進跨國比較的有效性。

分析策略採用三階段類型化方法。第一階段為“維度化編碼”,即將四國的政策資料與研究發現依結構暴露、文化詮釋與制度吸納三個維度拆解並分類。第二階段為“差異辨識”,比較四國在三個維度上的制度差異,包括強度、覆蓋率、制度化深度與識別責任的位置。第三階段為“耦合分析”,評估三個維度在各國如何連接或斷裂,並據此歸納其風險治理類型,例如,公共衛生導向、平台導向或碎片化治理。此方法可避免因制度背景過度差異所造成的不可比性,同時突顯風險生成鏈條中的制度邏輯。

四國的選取基於三項理由。第一,四國均為高度多元文化社會,語言與文化多樣性

相當顯著(見表1)。第二,四國博彩治理體系成熟,政策文件與官方調查相對完備,具備跨國分析的可行性。第三,四國在處理少數族裔博彩風險方面呈現明顯的制度分化,具有比較政策分析的研究價值。需要強調的是,本文並未將“語言多樣性”視為少數族裔博彩風險的解釋變數。鑒於四國對“少數族裔”的官方界定差異極大,相關統計口徑難以直接對齊,本文僅以“使用語言數量”作為多元文化治理環境複雜度的背景指標,用於說明不同國家在制度設計上所面臨的文化與語言協調壓力。該指標不反映族群在博彩市場中的權力位置、參與程度或風險暴露強度,亦不用於解釋治理成效差異。

表 1 四國語言多樣性概況

國家	使用語言數量 (普查/官方)	主要語言類別	語言多樣性說明
澳大利亞	350+ 種語言	英語、約 160 種原住民族語言、華語(普通話/粵語)、阿拉伯語、越南語、旁遮普語等	屬全球語言多樣性最高的國家之一,新移民語言成長迅速
新西蘭	160+ 種語言	英語、毛利語、新西蘭手語、華語、印地語、薩摩亞語、東加語等	太平洋語族比例特高,亞洲語言擴張顯著
英國	300+ 種語言	英語、旁遮普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波蘭語、阿拉伯語等	倫敦使用超過 250 種語言,多屬歐洲與南亞語系
加拿大 (安大略省)	450+ 種語言	英語、法語、70+種原住民族語言、華語、旁遮普語、塔加洛語、西班牙語等	北美語言最為多樣的國家之一,移民語言與原住民族語言並存

註:四國對“少數族裔”之官方界定差異較大,難以直接作為可比變項。本表以“語言多樣性”(使用語言總數)作為多元文化背景之替代指標。本表所列“語言多樣性”僅用於描述各國多元文化治理的背景複雜度,而非作為少數族裔博彩風險或治理效能的代理變項。

資料來源: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2021); Stats NZ(2018);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UK(2020); Statistics Canada(2021)。

在呈現比較結果之前,本文先在術語與資料口徑方面進行統一處理。加拿大的相關資料除非特別標明主要反映安大略省的線上博彩市場,並非全國情況;澳大利亞、英國與新西蘭的官方統計亦各自採用不同取樣方法與時間窗,本文已於表註中逐一標

示。為避免語境差異造成混淆,本文統一使用“少數族裔(ethnic minorities)”作為分析對象。英國常用“少數族裔群體(minority ethnic groups)”,澳大利亞使用“CALD(文化與語言多樣背景)”,新西蘭特別關注“毛利族”“太平洋島民”與“亞洲族群”,加拿大

(安大略省)則常使用“可見少數族裔(visible minorities)”或“族裔化群體(racialized groups)”。以上差異均已在研究設計中加以處理,使跨國比較保持語義一致性。

3 四國博彩產業結構與少數族裔風險概況

在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和加拿大(安省),博彩暴露主要由三類場域構成:電子博彩機、賭場與線上平台。澳大利亞的線下電子博彩機密度極高,且賭場具有高度社會正當性,使多數移民社區同時面臨地理與文化上的“雙重暴露”;CALD 群體雖參與率較低,但其問題化風險為主流群體兩倍以上,文化羞恥與語言障礙造成明顯的外顯延遲(Livingstone & Rintoul, 2020; Gainsbury, et al., 2019; Hing, et al., 2022)。新西蘭的暴露主要來自弱勢社區中的 Class 4 機台與城市賭場,其中毛利族與太平洋島民(Māori and Pacific Peoples)在暴露與危害上均顯著高於全國平均水準;亞裔群體則呈現“參與低—危害不低—求助極低”的典型隱匿型風險,部分原因在於族群分項數據不足造成的制度不可見性(Abbott, et al., 2018; Asian Family Services, 2019; Dyal, 2010)。英國的暴露結構轉向高度平台化,由廣告、贊助與演算法驅動,雖然實體賭場對部分族群仍具吸引力,但線上產品才是主要風險來源;南亞裔、非洲及加勒比裔與東亞群體均呈現不同形式的隱匿性問題軌跡,問題行為常停留於家庭或同儕網絡內而延遲被制度捕捉(Wardle, et al., 2019; Reith & Wardle, 2022; Keen, et al., 2021)。加拿大(安省)則同時存在省級賭場、機台區與快速擴張的商業線

上博彩,暴露與脆弱社區高度重疊;原住民因歷史脈絡與社區暴露呈長期高危害,亞裔與新移民則普遍出現“參與低但危害比例高”的模式,求助率始終偏低(Williams & Volberg, 2013; GREO, 2021)。整體來看,這四國雖在產業規模與監管制度上差異甚大,但少數族裔群體在“地理暴露、文化詮釋與制度可見度”三方面的共同弱勢,使其普遍呈現跨國一致的“低參與—低求助—晚呈現”風險特徵。

4 四國博彩風險治理跨國比較分析

四國的博彩風險差異可從結構暴露、文化詮釋與制度吸納三個維度理解。雖然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與加拿大(安省)皆屬高度多元文化社會,但其博彩市場開放程度、族群文化脈絡與制度承載方式迥異,因而在少數族裔身上呈現不同風險組合。

4.1 結構暴露

四國在博彩供給密度、產品構成與線上滲透度上的差異,構成少數族裔風險鏈條的“結構起點”(見表2)。澳大利亞的電子博彩機總量約 185,933 台,人均密度約每 135 名居民一台,是四國中分佈最高的;機台集中於社區俱樂部、酒吧與弱勢社區,使博彩在日常生活中高度可及。同時,約 65.1% 的成年人在過去 12 個月內至少參與過一次博彩,其中 56.1% 的曾在網上博彩,形成“線下高密度×線上高參與”的雙重暴露模式。

新西蘭的線下暴露則相對受限,全國約 17,000 台電子博彩機,人均密度約每 300 名

居民一台。線上博彩僅限官方彩票與賽馬管道,其他投注多流向海外平台。過去 12 個月內,約 64.1% 的成年人參與過博彩,屬中度暴露情境。

表 2 四國博彩結構暴露關鍵資料

國家	電子博彩機數量(最近)及人均密度	線上博彩占總體比重/成長趨勢
澳大利亞	185,933 台(2023 年 6 月,全國電子博彩機數)(Queensland Government Statistician's Office,2024);約每 135 名居民擁有一台博彩機(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 2024)	約 65.1% 的澳洲成年人在截至 2024 年 10 月的前 12 個月內至少參與過一次博彩活動,較 2019 年的 57% 顯著上升。一半以上(56.1%)在過去一年中是在網上參與(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2025)
新西蘭	約 17,000 台(2024 年,全國所有類型博彩機)(Department of Internal Affairs,New Zealand,n.d.);每 300 名居民一台博彩機	約 64.1% 的新西蘭成年人在截至 2025 年 3 月的前 12 個月內至少參與過一次博彩活動。該比率自 2018 年至 2020 年間保持穩定,但在線賭博的參與率在 2020 年曾翻了一番,達到 27%(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New Zealand 2024)
英國	約 188,000+台(2025 年,各類博彩機)(UKGC, 2025;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UK,n.d.);每 360 人一台	約 60% 的英國成年人在截至 2025 年 1 月的前 12 個月內至少參與過一次博彩(含購買彩票)。在調查前四週內,48% 參與某種形式的博彩;若排除國家彩票,參與率為 28%。有 37% 的成年人在過去四週內曾在線博彩。遠端/線上博彩年度總博彩收益(GGY)為 78 億英鎊,占全英博彩市場(不含彩票)總收入的 46%(UKGC,n.d.)
加拿大	約 67,000 台(2023 年,全國電子博彩機)(Ontario Lottery and Gaming Corporation,2024;Ontario Ministry of Finance,2024);全國平均每 610 人一台,其中安大略省 23,750 台(約每 680 人一台)	約 73.1% 的成年人過去一年曾參與某種博彩活動;約 10.3% 的成年人經常進行線上賭場遊戲。18~29 歲族群中約三分之一(32%)曾在線博彩(Canadian Centre on Substance Use and Adiction&Mental Health Commission of Canada,2025)。安大略省線上博彩市場開放後成長迅速,已成為北美最大受監管市場之一(iGaming Ontario,2025b)

資料來源:Queensland Government Statistician's Office(2024); Department of Internal Affairs, New Zealand(n.d.);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2025);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New Zealand(2024); Ontario Lottery and Gaming Corporation, Canada(2024), UKGC(2025; n.d.);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UK(n.d.);Ontario Ministry of Finance,Canada(2024); iGaming Ontario,Canada(2025b);Canadian Centre on Substance Use and Addiction & Mental Health Commission of Canada (2025)。

英國的線下暴露低於澳新兩國,全國約 184,126 台博彩機,密度約每 360 人一台。但其數字管道暴露高度成熟:過去 12 個月內,約 60% 的成年人參與博彩;遠端/線上博彩年度總博彩收益(GGY)達 78 億英鎊,占英國整體非彩票博彩市場約 46%。平台化因此構成英國博彩暴露的主要來源。

加拿大全國約有 67,000 台電子博彩機,平均每 610 名居民一台,遠低於澳大利亞與新西蘭;安大略省約 23,750 台(約每 680 人一台)。線上博彩在 2022 年商業化開放後快速增長,使安大略成為北美最大受監管的線上博彩市場之一。全國層面,約

73.1% 的成年人在過去 12 個月內曾參與博彩,10.3% 經常參與線上賭場遊戲。

整體而言,澳大利亞與英國分別代表“線下極高密度”與“平台集中”的強暴露模式,使弱勢族群更容易在地理環境或高頻數位接觸中反覆暴露於博彩產品。安大略的暴露取決於省級制度,呈現地域化差異;新西蘭則因供給收斂與場址限制形成最低暴露基線。從三維風險框架觀之,這些結構差異決定了後續文化詮釋與制度吸納的壓力來源:供給越集中、滲透越高,文化屏障與制度延遲越可能被放大,而暴露強度較低的國家(如新西蘭與部分加拿大省份)在一定程

度上緩衝了後續文化與制度層面的脆弱性。

4.2 文化詮釋

在三維風險框架中,文化詮釋處於風險生成鏈條的第二環節,決定博彩行為與危害在特定族群中的意義建構、呈現方式與外顯機率。跨國研究顯示,多數族裔群體在博彩

領域呈現一致的“低參與—高危害—低求助”模式,表 3 所列數據亦反映此趨勢。這一悖論並非源於更高的行為頻率,而是文化規範、家庭義務、宗教觀點、移民壓力與情緒表達習慣共同形塑了危害的詮釋方式,使問題更可能被內化、延遲或隱藏。

表 3 四國少數族裔博彩風險特徵

國家	典型少數族裔群體	博彩參與率(少數族裔 vs 全國)	問題博彩率(少數族裔 vs 全國)	博彩求助行為
澳大利亞	原住民族(澳洲原住民、托雷斯海峽島民)	約 72% vs 63% (顯著較高)	最新的研究(2025 年)顯示,土著居民(原住民族)經歷賭博相關危害的比例是非土著居民的近兩倍(27.1% vs 14.6%);博彩成癮者的自殺率是普通人群的 15 倍。高風險玩家(包括原住民)中有 66%報告曾經歷嚴重的財務困難,例如沒飯吃或賣掉財物來應對壓力。在高風險博彩人的伴侶中,有 19%曾經歷親密伴侶暴力(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2025)	雖然高風險賭博者尋求正式幫助的總體比例低(2018 年數據為 36%),但原住民族的求助率仍然不成比例地低(Centre for Gambling Research, Australia, 2025)
	文化語言多樣性群體(華裔、南亞裔、中東背景等)	略低於全國平均	雖然這些群體整體參與率較低,但參與者出現嚴重賭博問題的風險是普通澳大利亞賭徒的 2~7 倍(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2016)。來自 CALD 背景的人群經歷自身或他人賭博帶來的危害與高心理困擾和孤獨感強烈相關。在某些亞洲社區,親密伴侶暴力的終生發生率較高,研究表明賭博問題與家庭暴力之間存在關聯(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 2025)	早先的研究約 68%表示不願或不會求助;語言/文化障礙顯著(Dickins &Thomas, 2014)。現在 CALD 社區成員尋求正式博彩幫助的可能性仍然較低
新西蘭	毛利族與太平洋島民	略高或接近全國平均	毛利族人是普通人群的 3.13 倍,太平洋島民是普通人群的 2.56 倍,他們更有可能成為中度風險或問題博彩者(Ministry of Health, New Zealand, 2024; 2025)	雖然求助率相對較高(約 12.6%)(Abbott, et al., 2018),但目前的服務壓力很大,需要適應不斷變化的賭博環境
	亞裔群體(華裔、南亞裔)	30~40% vs 65% (顯著較低)	中高風險者占比為全國平均的 2 倍以上	求助率僅約 1.7%;羞恥感與語言障礙限制求助(Asian Family Services,2019)
英國	BAME 群體(南亞裔、非洲裔、加勒比海裔)	35% ~ 40% vs 45%~50%(按過去 12 個月計算, BAME 群體仍顯著較低)(UKGC, 2021)	10.7%自認“投注過度”,為全國平均(3.2%)的 3 倍以上(UKGC, 2021)	求助率偏低;對主流服務缺乏信任(UKGC, 2021)。但近年來上升。截至 2024 年,近三分之一(30%)經歷任何程度賭博問題的成年人尋求了治療、支持或建議,幾乎是 2020 年(17%)的兩倍(UKGC,2024)
加拿大(全國)	原住民族群(第一民族、因紐特等)	2.4% vs 64.2% (較高)(Williams & Volberg, 2013)	原住居民處於中度至重度風險的比例(4.5%)是非原住居民(1.5%)的 3 倍(Williams & Volberg, 2013)。	多依賴社區內部支持;主流服務使用率偏低(Williams & Volberg, 2013)。

續表 3 四國少數族裔博彩風險特徵

國家	典型少數族裔群體	博彩參與率(少數族裔 vs 全國)	問題博彩率(少數族裔 vs 全國)	博彩求助行為
	亞裔與新移民群體	參與率略低於全國平均 (GREO, 2021)	如果他們參與賭博,風險會更高,風險為主流群體的 2~3 倍(GREO,2021)	求助率極低;多依賴非正式社會 網絡(GREO,2021)

註:問題博彩率指 PGSI $\geq$ 8 或各國等值指標。鑒於各國官方調查在時間窗、取樣方法與地理覆蓋上的差異,本文所呈現的參與率與問題博彩率僅用於辨識風險分佈的方向性模式,而非進行精確的數值排序或統計顯著性比較。跨國分析的重點在於風險如何進入或未能進入治理鏈條,而非其絕對量值高低。

資料來源: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2016, 2025);Centre for Gambling Research (2025);Gainsbury et al.(2014);Ministry of Health, New Zealand(2024;2025), Abbott et al.(2018);Asian Family Services(2019);UKGC (2021, 2024);Williams &Volberg(2013); Gambling Research Exchange Ontario & Statistics Canada(GREO, 2021)

澳大利亞原住民族群的高危害部分來自賭博在社群內的社會性與互惠意義,加上經濟脆弱與歷史創傷,形成特有的詮釋邏輯;CALD 群體則因語言隔閡與面子、羞恥規範,使危害極不易外顯。新西蘭毛利族與太平洋島民的高風險顯示文化詮釋如何與社區環境與集體義務交互作用;同時亞裔群體雖參與率最低(以過去 12 個月為基準),但在“保持體面、避免羞辱”的文化框架內,問題化往往被視為家庭內部議題,導致求助率極低。英國 BAME 群體中,南亞裔因宗教與家庭規範而呈現較低年度參與率,但其危害水準並未因此下降;非洲與加勒比裔群體則以社交網絡與娛樂文化形成不同的風險詮釋軌跡。加拿大(安省)原住民的文化詮釋結構與澳大利亞相近,而亞裔與新移民群體則常將博彩視為情緒調節或壓力出口,使危害更難被正式體系捕捉。

在四國中,不同少數族裔的危害差異並非行為強度之別,而是“危害如何被理解、呈現與界定為問題”的文化差異,這決定了風險是否進入制度視野。文化詮釋因此並非附屬於行為的背景因素,而是影響風險可見度與求助時機的核心機制。尤其在澳大利亞與英國等高暴露環境中,文化詮釋對危

害可見度的放大效應更加顯著,使同樣的結構性暴露在不同族群中產生截然不同的風險軌跡。

4.3 制度接納

在制度接納層面,四國的治理體系呈現不同的識別邏輯與風險承載能力(見表 4),進而影響少數族裔風險能否及時進入治理軌道。制度接納不僅涉及服務可及性,更包括“誰負責識別”“依何標準識別”與“資料能否跨平台整合”等核心制度選擇(Wardle, et al.,2019)。

澳大利亞採用聯邦與州並行的治理架構:州/領地主管地面博彩,聯邦負責網路博彩與廣告規制。此種多中心制度導致標準不一致與執行落差,部分州因財政依賴度高而可能較為寬鬆(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ACMA, 2023)。澳大利亞於 2023 年推出全國線上自我排除平台 BetStop,使高風險個案能透過實名制被識別,但跨平台的強制性識別尚未建立,且離岸博彩約佔線上市場的 36%(H2 Gambling Capital,2025),造成明顯的制度空窗。

新西蘭採用中央集權式治理,由內政部透過《賭博法》與 2019-2025 年國家博彩危

害防制策略統一管理。新西蘭持續透過國家博彩危害防制策略(最新為 2025/26 - 2027/28)將特定族群需求制度化(Ministry of Health,2025)。當前合法線上博彩僅限官方彩票與賽馬,但新《在線博彩法案》已準備引入更強的責任博彩義務(如更嚴格的廣告限制與未成年人保護),顯示制度吸納能力正從線下延伸至線上。

英國由統一的英國賭博委員會(UKGC)監管,是四國中最早將風險識別前移至平台端的司法管轄區。政府持續推動單一顧客視圖(Single Customer View,SCV)試點,使營運商能跨平台整合使用者行為資料,以辨識高損耗行為,但目前仍處於沙箱試驗階段(UKGC,2025)。2023 年白皮書指出,高損耗賭徒中僅有 0.84% 曾被平台主動介入(UKGC,2023),促使政府進一步引入分級損失門檻、更嚴格的 KYC 與身份驗證。英國因此呈現“平台主導”的制度吸納模式。

加拿大(安大略省)展現高度的省級差

異:博彩制度由各省獨立監管,缺乏全國一致的資料整合與識別機制(iGaming Ontario, 2025a)。雖然多省已推行 KYC 與省級自我排除系統,但省際間資料並不共用,使風險無法跨省整合。安大略省自 2022 年開放線上博彩市場後,已在既有 OLG My Play - Break 基礎上,積極開發涵蓋所有受監管 iGaming 網站的中央化自我排除系統。隨著市場成熟,2024-2025 財政年度總博彩收益(GGY)已達 32 億加元,使安大略省成為北美最大受監管市場之一,但全國層級的制度吸納與資料聯網仍屬鬆散(iGaming Ontario,2025a)。

整體而言,四國均正由傳統的被動求助模式轉向“主動識別+資料驅動”的治理路徑,試圖透過實名制、大數據與跨平台監管,使高風險行為能在早期被制度接納。然而,制度吸納能否涵蓋不同文化群體,仍取決於資料共用能力、文化回應性與治理透明度(Wardle, et al.,2019)。

表 4 四國制度差異

國家	文化回應性政策措施	平台識別機制與使用者行為資料
澳大利亞	缺乏全國統一策略;各州推動零散的少數族裔支持方案(Parliament of Australia, 2023)	全國自我排除系統 BetStop 已啟用;跨平台識別未形成;離岸非法線上博彩規模龐大(ACMA, 2023)
新西蘭	實施《2019-2025 國家博彩危害防制策略》;將毛利族、太平洋島民與亞裔需求制度化(Ministry of Health,New Zealand, 2019)	線上博彩僅限官方彩票與賽馬;缺乏對海外線上博彩的監管;線下無跨場館識別(Department of Internal Affairs,New Zealand, 2020)
英國	採用普適式政策(如年齡驗證、廣告規制),未有特定族群政策(UKGC, 2023)	推動單一顧客視圖(SCV),加強 KYC、分級損失門檻與更嚴格身分驗證(UKGC, 2023)
加拿大 (安大略省)	無聯邦文化政策;部分省份為原住民族群提供支援(Canadian Centre on Substance Use and Addiction, 2021)	各省獨立實施 KYC 與自我排除;安省開發中央化 iGaming 自我排除系統(開發中,預計 2026 上線);缺乏全國資料整合(iGaming Ontario, 2025a)

資料來源:ACMA(2023);Parliament of Australia (2023);Department of Internal Affairs,New Zealand(2020);Ministry of Health,New Zealand (2019);UKGC(2023);Canadian Centre on Substance Use and Adiction(2021);iGaming Ontario (2025a)。

5 結 論

本研究透過“結構暴露—文化詮釋—制度吸納”三維框架,系統性地剖析了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與加拿大(安省)在少數族裔博彩風險治理上的邏輯差異。研究發現,少數族裔博彩危害的核心問題並非源於族群本身的“脆弱性”或“高參與率”,而在於治理鏈條在不同維度間出現了制度性斷裂。這種斷裂使得風險在結構暴露的背景之下被文化意義重新轉譯,最終卻因制度選擇而被排除在正式治理視野之外,導致傷害的“不可見性”。

在結構維度上,監管的集中程度形塑了暴露風險進入治理體系的路徑。新西蘭與英國模式顯示,當權責相對集中時,博彩暴露較能以制度可識別的形式被納入監管;反之,澳大利亞與加拿大因權責分散導致的碎片化分佈,則增加了精準介入的難度。然而,結構性的制度吸納必須具備文化敏感度,否則將陷入因果循環的困境:當風險因羞恥感、家庭責任等文化詮釋而隱匿時,制度往往因缺乏數據支持而難以正當介入,而制度的缺位又進一步鞏固了風險的隱匿狀態。

基於上述發現,未來治理應致力於修補維度間的斷裂,將實務操作與宏觀視角相結合。首先,在操作層面,應優先推動“社區文化仲介”的制度化,透過具備文化適應力的守門員機制破除求助障礙,並結合跨平台的“單一顧客視圖”與數據聯網,提升高風險行為的早期攔截率。其次,在宏觀層面,必須正視數字化時代下的“治理黑洞”。澳大利亞高達 36% 的離岸博彩占比警示我

們,若境內制度吸納過於嚴格卻缺乏跨境監管協同,風險僅會向外轉移而非消失。

總體而言,風險的“不可見”並非族群特性,而是治理路徑選擇的結果。未來的研究與政策應從“數字主權”的高度出發,在完善族群分項數據的基礎上,建立跨維度的服務通道,方能真正實現多元文化社會中博彩風險的公平治理。

參 考 文 獻

- [1] Abbott M., Stone C.A., & Binde P. (2018). The auckland gambling study: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gambling and problem gambling in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Gambling Studies*, 18(3), 351-370.
- [2] 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 (ACMA). (2023). *Interactive gambling compliance and enforcement annual report 2022 - 23*. Canberra: ACMA. <https://www.acma.gov.au/publications/2023-11/report/interactive-gambling-compliance-and-enforcement-2022-23>.
- [3]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 (2024). *Australian gambling policy research report*. Canberra: AIFS. <https://www.dss.gov.au/gambling/gambling-research/gambling-research-australia>.
- [4]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 (2025). *National gambling prevalence study pilot 2024*. <https://aifs.gov.au/all-research/research-snapshots/national-gambling-prevalence-study-pilot-2024>.
- [5] Dickins M., & Thomas A. (2016). *Gambling in 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diverse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 https://aifs.gov.au/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documents/agrc-dp7-gambling-cald_0.pdf.
- [6] Dickins, M., & Thomas, A. (2014). *Gambling*

- in culturally and linguistically diverse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AGRC Discussion Paper No.7). Melbourne: Australian Gambling Research Centre. <https://aifs.gov.au/agrc/publications/gambling-culturally-and-linguistically-diverse-communities-australia>.
- [7] Dyall L. (2010). Gambling: A social hazard. *Journal of Gambling Issues*, 24, 81-103.
- [8] Gambling Commission, UK (UKGC) (2024). Industry statistics: Financial year April 2023 - 24. <https://www.gamblingcommission.gov.uk/statistics-and-research/publication/industry-statistics-november-2024-official-statistics>.
- [9] Gambling Commission, UK (UKGC) (2025). Industry statistics - Quarterly report - Financial year April 2025 to March 2026, Quarter 1: Official statistics. UK Gambling Commission.
- [10] Gainsbury S., Russell A., & Blaszczynski A., et al. (2019). Greater harm from gambling for minority groups: A consistent pattern across nations. *International Gambling Studies*, 19(3), 1-20.
- [11] Gambling Commission, UK (UKGC) (n.d.). Gambling participation in 2024. <https://www.aihw.gov.au/reports/australias-welfare/gambling>.
- [12] H2 Gambling Capital. (2025). Australia offshore wagering market analysis 2025. Responsible Wagering Australia. <https://responsiblewagering.com.au/illegal-offshore-market-doubles-costing-australia-billions/>.
- [13] Hing N., Browne M., & Russell A., et al. (2022). Gambling and digital platforms: Risk exposure and behavioural drivers. *Addiction*, 117(5), 1348-1357.
- [14] iGaming Ontario. (2025a). iGaming Ontario annual report. Toronto: iGaming Ontario. <https://igamingbusiness.com/gaming/online-casino/ontario-igaming-revenue-2024-25/>.
- [15] iGaming Ontario. (2025b). Year 3 market performance report: April 1, 2024 - March 31, 2025. iGaming Ontario. <https://igamingontario.ca/en/financial-reports>.
- [16] Keen B., Ireland J., & Baker T. (2021). Gambling harms among South Asian communities in the UK: A scoping review. *Health &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29(6), 1835-1845.
- [17] Livingstone C., & Rintoul A. (2020). Gambling-related harm: A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 *Public Health*, 184, 56-60.
- [18] Ministry of Health. (2025). Strategy to prevent and minimise gambling harm 2025/26 to 2027/28. New Zealand Government. <https://www.health.govt.nz/publications/strategy-to-prevent-and-minimise-gambling-harm-202526-to-202728>.
- [19] Nettleton J. (2024). Offshore gambling duty. New Zealand Government. <https://addisons.com/article/new-zealand-online-gambling-regulatory-update/#:~:text=This%20duty%20aims%20to%20strengthen,payable%20in%20addition%20to%20GST>.
- [20] New Zealand Department of Internal Affairs. (2023). Aotearoa gambling statistics report [Research report]. Wellington: DIA. <https://www.dia.govt.nz/Gambling-Statistics>.
- [21] New Zealand Ministry of Health. (2019). National strategy to prevent and minimise gambling harm (2019 - 2025) [Research report]. Wellington: Ministry of Health.
- [22]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n.d.). Population and migration statistics. UK Government. <https://www.ons.gov.uk/peoplepopulationand-community/populationandmigration>.
- [23] Ontario Lottery and Gaming Corporation. (2024). Annual report. <https://about.olg.ca/wp-content/uploads/2024/08/OLG-Annual-Report-2023-2024.pdf>.
- [24] Ontario Ministry of Finance. (2024). Ontario demographic quarterly: Highlights of third quarter. <https://www.ontario.ca/page/ontario-demographic-quarterly-highlights-third-quarter>.
- [25] Queensland Government Statistician's Office (2024) Australian Gambling Statistics: 1991 - 92 to 2022 - 23 (39th ed.). Queensland gov-

- ernment.<http://www.publications.qld.gov.au>.
- [26] Reith, G., & Wardle, H.(2022). The framing of gambling and the commercial determinants of harm: Challenges for regulation in the UK. In *The global gambling industry: Structures, tactics, and networks of impact* (pp.71-86). Wiesbaden: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
 - [27] Rotermann M., & Gilmour H.(2021). Statistics Canada & gambling research exchange Ontario. Indigenous Gambling Participation in Canada. <https://www150.statcan.gc.ca/n1/pub/75-006-x/2022001/article/00006-eng.htm>.
 - [28] UK Department for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 (DCMS). (2023). High stakes:Reforming gambling for the digital ag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high-stakes-gambling-reform-for-the-digital-age/high-stakes-gambling-reform-for-the-digital-age>.
 - [29] Wardle H., Reith G., & Langham E., et al. (2019). Gambling harms:A public health review.Public Health England Reports,1-130.
 - [30] Williams, R. J., & Volberg, R. A.(2013). Ontario problem gambling research centre & the Ontario ministry of health and long term care. Gambling and problem gambling in Ontario. <https://opus.uleth.ca/handle/10133/3378>.
 - [31] Young, M. M., Tuico, K. A., & Baxter, C. M., et al. (2025). Canadian centre on substance use and addiction & mental health commission of Canada.Gambling in Canada survey. <https://www.ccsa.ca/en/online-gambling-a-mong-young-canadian-adults-call-action>.